

决策与抉择

十五朝兴亡启示录

周萌 著

華文出版社

周萌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曾出版图书《唐五代僧人诗格研究——以僧皎然《诗式》为中心》，《史海传灯照长天——《资治通鉴》司马光述评集讲》等。

责任编辑：杨艳丽
装帧设计：孙瑞国

本著作着眼《资治通鉴》，试图用史实证明影响朝代兴衰的核心因素，基本勾勒出王朝更替的大致面貌及内在规律。观点深刻，发人思考，仔细阅读，可以把我们拉进历史，又拉出历史。

——深圳大学校长 章必功教授

本著作意在通过梳理朝代兴衰以提炼经验教训，传统观点固然重在道德教化而忽视经济缘由，可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全方位考察，以期在片面的深刻之外，能够获得思想的碰撞，促成观念的升华，以至完成文明的交融。若是在这方面有所反省、扬弃和创造，必将对我们贴近历史，总结历史，从而跳出历史，有莫大的帮助。

——《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姜安教授



定价：30.00元

决策与抉择

十五朝兴亡启示录

周萌 著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决策与抉择：十五朝兴亡启示录 / 周萌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75-4023-9

I. ①决… II. ①周…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
IV. ①D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6970号

决策与抉择：十五朝兴亡启示录

著 者：周 萌

责任编辑：杨艳丽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bs.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38 58336212

责任编辑 010-5833625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6.7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023-9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君子理念 ——《十五朝兴亡启示录》序一

深圳大学校长 章必功教授

深圳夏日午后的阳光总是如此火辣，周萌抱着文稿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早已大汗淋漓，这让我想起十二年前的第一次见面，类似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只是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份自信和沉稳，或许，时间雕刻了我们。

周萌的研究方向集中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但他对历史的兴趣始终浓厚，因此，当他作为交换教师在韩国东义大学度过一段安静闲暇的时光，就在先前通读《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先后写了《史海传灯照长天——〈资治通鉴〉司马光述评集讲》及《十五朝兴亡启示录——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中心》，前者重在归类整理司马光的史评，后者重在探寻朝代兴亡的踪影。

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征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并不仅是过去的某种存在，而是会在自身惯性作用下潜在影响现实的深层动因。无论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都要以通晓历史为前提，以反思历史为依凭，以创造历史为旨归。关注历史，正是对人类境遇的道义关怀，也是对社会政治的愿景关切。

历史不乏温情，但充斥残酷。《资治通鉴》开篇即有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做成酒器。十五朝兴亡，更是阴谋汹涌，腥风血雨。这种残酷与卑鄙，被写进历史，是让后人警觉之，唾弃之。



政治应当尽量远离兽性，远离罪恶。周萌的意思，儒家倡导的君子理念一直是推进社会文明的重要保证，也是引领未来的基准标杆。他一直坚信，不管个人还是群体，物质贫乏固然堪忧，而信念缺失实为大患。重塑信念，使当今人们书写的历史充满阳光，是周萌的追求。

他的这本著作，着眼《资治通鉴》，试图用史实证明影响朝代兴衰的核心因素，基本勾勒出王朝更替的大致面貌及内在规律。观点深刻，发人思考，仔细阅读，可以把我们拉进历史，又拉出历史。

文史哲原本就是相通的，周萌游走于文学、宗教和历史之间，相信对他的教学科研定会大有帮助，我也特别希望他陶钧文思，澡雪精神，在炎热的南方从事快乐而冷清的研究，取得富庶而警世的成就。



文明交融与中国历史的书写 ——《十五朝兴亡启示录》序二

《百家讲坛》主讲嘉宾 姜安教授

中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民族所独具的文化基因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格调和历史品质，一个一直视大一统为合法性政体存在的宗法式伦理性民族，却一再地受到多元化力量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分合式”的历史涌动构成了华夏文明波动的基本态势。如果将中国历史理解为一“巨河”时，我们就会看到，当主流文明趋势的巨大洪流有力地冲刷和荡涤着河川万物时，便有无数的山川河流纷至沓来，它们或者推波助澜，使得“巨河”形成更加宏伟的气势，或者迫使“巨河”的堤岸崩溃……而崩溃后的河床很快又会积聚新的更大的河流。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所彰显的民族个性和文化气象彪炳世界历史，给世界文明贡献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纠结、矛盾、对立、统一的经典案例。潮起潮落、拍岸柔磨，历史之岸在十五朝兴亡中被积淀、被冲刷、被构建，以特殊的“巨河之床”留给我们一个别样的文化标本，令人荡气回肠。

中国历史是神圣的。

中国历史具有非凡的境界。这种境界并非表现为与恶为邻的谋略，而在于因善而生的文明理念和生存智慧。它让人从黑夜中警醒感悟，彰显正道的可贵，坚持的可嘉，理想的可敬。经过



时间的检验，这些信念愈加熠熠生辉，给迷茫或沉沦的人们当头棒喝，指引正确的航向，中国历史的书写也由此展示了它的普世价值。正是基于这一点，国人对历史的执着有近乎宗教般的热情，修史也因而成为历代政府及士人共有的文化责任，除了保存国故和以史为鉴外，恐怕更深层的意蕴是文化精英试图通过历史书写构建天人合一与天下大同的文明模式，通过创新保持它的生命力，通过形成自觉的向心力而让所有人积极主动地传承中华文化，这是我们民族最引以为傲的精神。

中国历史是自具圆满的。

这种所谓圆满带有一定的自信与骄傲，唯我独尊，又包裹着懦弱的惧怕心理，封闭而内敛，既对内生性文明满怀狂傲，却又对蛮族文明的崛起忧心惶惶。在相对完整的农耕文明框架和体系下生成的制度机理和文化方式，厘定出的文明成为东方象征。但面对全球化浪潮，我们似乎同样需要另外的视角，这称得上是另一种与时俱进。在研究历史兴亡方面，汤因比《历史研究》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颇有些与我们若即若离的意味。他肯定“希腊模式（文化统一而政治不统一）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治乱交替而朝向统一）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我们在心有戚戚焉之余，很容易对他的成因分析感到意外，因为他把统一得以再三复兴归结为“有了避免恐惧威胁频频发生的保证”；把不时分裂的“中间时期”归结为“（大一统国家的）开支恐怕也到了最大限度，前科学时代的农业经济无力承受这种经济负担”。由此出发，汤因比推断，作为中国历史新起点的秦朝，由于“系统地革新了社会经济结构”而兴盛，自汉武帝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虽然懂得水利对农业和交通的价值，但对农业之外的经济事业不感兴趣”，正是经济结构



的缺陷导致了国家不断崩溃的事实¹。并不是说汤因比的观点完全正确，但至少为我们反思自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十五朝兴亡启示录》意在通过梳理朝代兴衰以提炼经验教训，传统观点固然重在道德教化而忽视经济缘由，可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全方位考察，以期在片面的深刻之外，能够获得思想的碰撞，促成观念的升华，以至完成文明的交融。若是在这方面有所反省、扬弃和创造，必将对我们贴近历史，总结历史，从而跳出历史，有莫大的帮助。

历史分正史、野史、真史、伪史，追问历史需要一种哲学态度：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以行者的姿态游渡中国历史之河，尚需勇气，更需信仰！

我期待着周萌在寄情历史的旅途中怡情养性而又洞明世事，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为当代士林和文明交融锦上添花！

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第七章《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秦朝：法治是柄“双刃剑” / 5

第二章 西汉：韬光养晦利天下 / 18

第三章 东汉：文教兴国非虚言 / 37

第四章 蜀汉：布德守法修美政 / 52

第五章 西晋：攘外务必先安内 / 63

第六章 东晋：意识形态亦长城 / 77

第七章 前秦：修明政治服四夷 / 88

第八章 刘宋：国运有待继承人 / 102

第九章 梁朝：积善莫若行正道 / 119

第十章 北魏：稳妥改革为上策 / 133

第十一章 北齐：身居上位当立德 / 148

第十二章 隋朝：律己重民谋长治 / 165

第十三章 唐朝：适度开放护国本 / 183



第十四章 后唐：武功终须到文治 / 200

第十五章 后晋：国家利益焉能让 / 215

结 语 / 225

附 录 《贞观政要》论兴亡 / 228

主要参考文献 / 254

引言

中国的含义在从都城、中原到国名的扩展中，逐渐完成了从地域指向文化象征的华丽转身，也就是说，作为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相对举的概念，中央之国的自觉意识并不是因地理观念狭隘而产生的夜郎自大，而是深层反映了传承并创造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感。早先的族名华夏同样如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形象地解释为梧桐树般的中国人，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具体落实为服章之美和礼仪之大，亦即服饰华美、文化繁荣、道德兴盛、疆域辽阔，全面反映了以文化立国而引领世界的基本指向。后来这两个词合成出中华，既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显现，也是族群认同和自我升华的共识，体现了国人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事实上，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向来开放。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已有不少关于周边民族的记录，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专设朝鲜、东越、南



越、西南夷、匈奴列传，后代正史无不著录交通境外的情况，再加上对外贸易和宗教传播等活动，说明古人从来不是坐井观天。更为直观的证据是，现存最早的中文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1389），朝鲜使臣金士衡等人参考蒙元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释清浚《混一疆理图》所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早于西方百余年准确描绘了非洲好望角，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山海輿地全图》（1584）已与今人的认知相差无几了。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也毫不逊色，不仅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而且铸就了以儒、释、道为主体的精神文明。根据德国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所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犹太先知，中国老子和孔子，印度释迦牟尼，各自用理性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以及终极关怀的觉醒为各自文化奠基并使之延续至今。儒家思想典型诠释了上述原则，特别是它所倡导的精英意识，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为此，儒家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而君子的实践是理论最好的注脚，例如史上四次著名的读经运动，展现了读书人良好的道德风貌和深切的道义关怀，因为面对礼崩乐坏，先秦诸子通过百家争鸣探索方向；面对焚书坑儒，西汉经师通过复兴典籍反对暴政；面对政局紊乱，东汉党人通过品评清议捍卫正道；面对思想佛化，两宋儒生通过重建儒学承继道统，他们是民族文化当之无愧的主干和脊梁。

然而，自近代以来，随着对外军事失利，我国政治与文化日渐走上了西化之路。鸦片战争（1840）引发洋务运动（1861—1895），主张中体



西用；甲午海战（1894）引发戊戌变法（1898），学习日本式君主立宪；辛亥革命（1911）后建立民国（1912），学习美国式民主共和；解放战争（1945—1949）后建立共和国（1949），初期学习俄国式社会主义，直到改革开放（1978）以后才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段经历让我们得出了落后就会挨打的结论，其实，蒙元和满清入主中原属于野蛮征服文明，挨打并非因为落后，所以才有马克思所说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西方列强入侵的因果截然不同，政治军事的被动源于文化创造力的丧失，中体西用的必然失败进一步促成了对传统的全面改造，废止科举（1905）为制度的撤除，新文化运动（1915—1919）为内容的取代，五四运动（1919）为方法的重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为精神的毁灭，而当下科技主义神话带来了地球村的类同。换句话说，我们已经破解政治西化的魔咒，却因没有当代建构而无从遏制文化西化的势头。这恰恰是最危险的，正如闻一多先生早年所忧虑的：“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杜渐防微之责，舍我辈其谁堪任之！”（《闻一多全集·书信·一九二五年致梁实秋》）因此，继承传统而融贯中西，恢复中华文化固有的自信心和创造力，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紧迫的历史任务。

在全球化浪潮和英语强势背景下，文化创新显得尤为紧要，因为以核威慑为前提的大国争夺，归根结底是文化向心力的竞争。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即是重新恢复以文化为本而引导世界的恢弘气象，文化复兴自是题中之义和显著标志。在此之中，大学作为精英聚集地，负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除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性批判以外，更应通力培育人而不是人才，因为后者只是为了适应工业时代的琐细分工所需，而前者是大写和超越的，既在人格内涵上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金明馆丛稿二编·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又在时代担当上有宋代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的理想和信念。这或许是世界一流大学共通的宿命吧。

通往安国寺的小路林荫蔽日，完全隔绝了外面的喧哗与骚动，清凉的山风轻轻拂来，夕阳在树叶缝隙间投下斑斑点点。我手捧《资治通鉴》，坐在路旁的小木亭里，遥望西方湛蓝的长空，漫看十五个朝代的起起落落，思寻司马光圈点的诸多问题，不禁对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工部集》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肃然起敬。漫漫长河的狼烟渐渐消散，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寺院的钟声悄然响起，我拾级而上，站在长满爬山虎的矮墙外，凝神静听诵经之声，白玉兰在院中淡然绽放，而我始终是槛内人。